

【書評】

## 中國圖書出版的「典範轉移」

### ——讀蘇精《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鄒振環\*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

蘇精

《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

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

ISBN 978-986-350-025-4

第一次聽說蘇精教授的大名是在上一個世紀的九〇年代初，其時我剛剛完成了一篇關於京師同文館譯書出版的論文。那些年兩岸交流受限，儘管已從他人論文的引述中得知蘇精教授在 1978 年和 1985 年先後完成出版了《清季同文館》和《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兩書，但仍然無法獲取這些著作。記得學校參考閱覽室的一位老師還鄭重其事地告訴我，臺灣有兩個蘇精，一個是研究同文館的，還有一個是研究藏書家的，著有《近代藏書三十家》。若干年後才恍然大悟，其實研究同文館和研究藏書家，是同一個蘇精教授（為免繁瑣，下均直呼大名）的兩張學術面孔。

---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zouzh@fudan.edu.cn

## 一、挑戰自我的成果

蘇精出生於 1946 年，1972 年畢業於臺灣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1976 年進入中央圖書館工作。由於不滿意既有的關於晚清同文館的研究，經過幾年的努力，他首先完成了《清季同文館》，該書分十一章，分別討論同文館成立的背景、京師同文館的成立及其演變、館務行政的經費、課程與教學、師資、學生、京師同文館的問題、上海廣方言館、廣東同文館、清季同文館的成效等。作者不僅全面梳理了同文三館的資料，討論了同文館與四譯館、俄羅斯文館之間的淵源關係，研究了同文館的譯書課程，並整理出非常翔實的《京師同文館出版西學圖書書目》，張朋園在該書序言中特別推薦，稱該書的特點是重視京師同文館、上海廣方言館和廣東同文館三館的比較討論。<sup>1</sup> 1984 年他又在舊作的基礎上，修訂增補，進一步從同文三館的老師和學生生平和著述入手，完成了新作《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使中國近代外語教育史的研究，有了進一步的拓展。同時，在工作之餘，他流覽館藏善本古籍，每見書中歷代藏書家累累鈐印和朱墨圈點的題跋，發願收集藏書家的資料予以整理介紹，經過大約五六年的努力，完成了《近代藏書三十家》。該書是一部清末民初藏書家的小傳，從盛宣懷、葉昌熾、盧靖、李盛鐸、梁鼎芬、葉德輝，一直討論到張元濟、董康、梁啟超、丁福保、鄭振鐸，介紹其家世生平、藏書聚散經過、所藏內容特點、編印校勘或著述，以及與藏書有關的行實。各篇自 1979 年起陸續在《傳記文學》、香港《明報月刊》、《中央圖書館館刊》等雜誌上連載，於 1983 年集結成書，由臺灣傳記文學出版社初版。二十多年後的 2009 年，該書還被認為是「開近代藏書史研究之先河」的論著，<sup>2</sup> 全書經作者修訂，由北京中華書局重版，據說初印 4,000 冊，五周內即銷售一空，又加印了 3,000 冊，可謂洛陽紙貴。

蘇精不是那種一輩子滿足於一畝三分地不斷耕耘的學者，就在撰寫近代藏書家故實的同時，他已經對中國書籍如何從傳統的木刻線裝轉變為西式的活字平裝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一方面因為工作上的困境，更重要的還是緣於學術興趣的轉換。1992 年，他竟然辭去了安身立命的中央圖書館的優裕工作職位，以將近半百之年負笈英國里茲 (Leeds) 大學，攻讀「書目、校勘與出版史」的碩士學位。英國的碩

<sup>1</sup> 蘇精，《清季同文館》（臺北：蘇精 1978 年自印本），〈張朋園序〉，頁 3。

<sup>2</sup>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編後記〉，頁 275。

士僅僅一年，其中有一個學期撰寫碩士論文，他選擇了英國傳教士麥都思 (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 和墨海書館作為碩士論文的題目。期間還要兼顧上課、書面作業和印刷實習。一年回臺後卻無法找到合適的教職，於是他孤注一擲，賣掉了棲身的小屋和所有的藏書，於 1994 年初再赴英國倫敦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成為無家可歸的過河卒子。經過歷時三年的博士訓練，1997 年以倫敦傳教會的中文印刷事業為論題，獲得了博士學位。

回臺後他先後任教於南華管理學院出版學研究所、淡江大學資訊與圖書館系、雲林科技大學漢學資料整理研究所、輔仁大學和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他以西方傳教士與中文印刷出版史專家的全新面貌出現在學界，2000 年完成出版了《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灣學生書局）、2005 和 2006 年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先後推出了他的《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和《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兩書，又再接再厲，寫出了《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臺灣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0 年）。2014 年 7 月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推出了他厚達 595 頁的新作《鑄以代刻：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下簡稱《鑄以代刻》）一書。勇敢地面對人生的挑戰，使他在退休前後的十多年裡，留下了五本都足以傳世的佳作。

印刷史的研究，可以從傳統的目錄版本學入手，研究範圍偏重於圖書的形制、鑒別、著錄、收藏等方面的考訂的探討；或可從書籍史的角度切入，注重圖書發展的各種相關問題，如斷代和地區性的刻書史，印刷工匠或刻書機構，活字、版畫、套印、裝訂等專題的敘述和分析，難度最大的是從印刷文化的角度展開，從印刷技術的變化和影響加以分析，進而研究這種變化對學術、社會、文化等方面產生的後果，這就需要作者具有社會學、科技史、文化史等多學科的知識準備。蘇精早年在圖書館積累了豐富的圖書目錄學的知識，後又系統接受過西方印刷史和書籍史的訓練，並積累了深厚的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知識。正是因為有這些重要的學術準備，才能使作者在《鑄以代刻》這一精細之作中為我們勾勒出西方印刷術自西徂東和活字印刷技術由南而北轉移的清晰圖像。

## 二、檔案如是說

《鑄以代刻》一書主要探討基督教傳教士自 1807 年來華至 1873 年為止的六十餘年間輸入西式活字以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過程，詳細地描述了傳教士們是如何創

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全書除「導言」外，分為十二章，一、從木刻到活字——馬禮遜的轉變；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澳門印刷所；三、麥都思及其巴達維亞印刷所；四、中文聖經第一次修訂與爭議；五、初期的墨海書館 1843-1847；六、偉烈亞力與墨海書館；七、香港英華書院 1843-1873；八、美國長老會中文印刷出版的開端；九、澳門華英校書房 1844-1845；十、寧波華花聖經書房 1845-1860；十一、華花聖經書房遷移上海的經過；十二、姜別利與上海美華書館，後附錄參考書目和索引。作者在討論這一「變局」的過程中突出獨創性，略人所詳而又詳人所略，不僅對於別人的研究力求避免重複，對於自己以往的成果所涉及過內容也不再重複討論，如對倫敦會為主的墨海書館的研究儘量避免和他人研究的重複，而於長老會部分，如澳門的華英校書房和寧波的華花聖經書房則詳細展開，嘗試繪製西方印刷術來華傳播比較完整與清晰的畫面。作者謹守專業，就題論說，甚少引申發揮，有一份材料說一份話，使全書的敘述格外嚴謹。

「檔案如是說」是蘇精部落格的一個總標題。讓「檔案」來言說，充分運用中外檔案，幾乎堪稱是蘇精所有研究論著中最大的特色，《鑄以代刻》第一個特色也是充分運用檔案。早在 1979 年初，他在撰寫《近代藏書三十家》過程中，在中央圖書館發現了一批 1933 年在南京創館到 1948 年遷往臺灣為止的舊檔，其中有部分是關於當年購買古籍的記錄，於是他以此舊檔案為基礎，並參照其他資料，撰寫了〈抗戰時秘密收購淪陷區古籍始末〉一文，發表在 1979 年 11 月的第 35 卷第 5 期《傳記文學》上，並作為《近代藏書三十家》初版的附錄。<sup>3</sup> 在研究同文三館的過程中，他也是利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外交檔案的「出使設領檔」等。<sup>4</sup> 在英國留學期間，蘇精幾乎每天都與傳教士的檔案和手稿朝夕相對，1997 年回國後，他繼續沉浸在縮微膠捲的英文檔案中，這些檔案包括倫敦會檔案、英國東印度公司檔案、馬禮遜父子檔案，以及美國長老會外國傳教部檔案、美部會檔案、聖公會傳教會檔案等，至 2010 年先後抄錄了二百六十多萬字的傳教士檔案。上述《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中國，開門！——馬禮遜及相關人物研究》和《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三書，都是他孜孜不倦地利用英國各圖書館檔案機構保存的傳教士檔案，如倫敦會、英國東印度公司等機構的檔案等，以及馬禮遜等人的出版品，辨析相關史實，以多個嶄新的角度呈現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與中文出版之關係，以及馬禮遜的親友同工斯當東、

<sup>3</sup>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頁 223-236。

<sup>4</sup> 蘇精，《清季同文館及其師生》（上海：上海印刷廠 1985 年自印本），〈自序〉，頁 1。

米憐與馬儒翰；馬禮遜施洗的華人信徒蔡軻、梁進德、屈昂等的生平行事及與馬禮遜的關係；馬禮遜在中國與英國教學中文的經驗以及關於他的研究文獻。而《基督教與新加坡華人：1819-1846》一書，則是他利用在新加坡設立布道站的四個英美傳教會檔案，重新建構並解釋了基督教傳入新加坡的背景與經過，討論傳教士對華人的講道、教育、出版與醫藥等事工內容，並從檔案中發現這段期間共有十三名華人受洗成為基督徒的事蹟，從而更正了以往認為當時沒有華人接受基督教信仰的誤解。《鑄以代刻》與作者之前所撰寫的所有著作類似，均據第一手資料——傳教士的手稿檔案完成。所不同的是，他將視野範圍從之前倫敦會和美部會的檔案擴大到長老會的手稿檔案，從中他抄錄了四十五萬字的書信內容，透過對大量資料之爬梳，發掘許多鮮為人知的印刷機構的歷史、印工的故事，探討了傳教士的印刷與鑄字工作。

檔案言說的主要功效，就是能夠對很多史實作出較之前人更精細的結論和更準確的判斷。麥都思和墨海書館是蘇精碩士論文的選題，也是他傳教士中文出版研究的重要起點。該書第五章根據倫敦會檔案提供了麥都思 1843 年 12 月 24 日抵達上海開始籌建，1844 年 1 月 23 日或 24 日將印刷機器帶到上海，並於 1844 年 5 月 1 日正式印書的準確時間。也讓讀者知道了該館印刷的第一種新書是《真理通道》，是該館初期「最重要的一種傳教出版品」，總印數超過六十萬頁。<sup>5</sup> 關於墨海書館究竟停業在何時，學界至今爭論不休，作者根據現存的倫敦會華中地區的檔案中 1865 年 12 月 8 日慕維廉寫給同會秘書梯德曼的信，說明墨海書館在過去的五年裡一直由自己經手管理，期間還印刷了十萬部新約與《五車韻府》一書。1866 年 8 月中，他還向穆廉斯在彙報結束這一書館的進度，可見該館結束在 1866 年，同時也證明《五車韻府》是由墨海書館而非美華書館重印。<sup>6</sup> 美華書館從 1860 年創辦至 1932 年結束前後持續七十一年，這是近代傳教士在華設立的最重要的新教出版機構之一，但遺憾的是至今尚無關於這一機構的專門學術論著，即使關於該館初期的館址究竟在哪裡也眾口不一，或說是大北門外，或說是大南門外。作者通過詳細材料的比對，準確地說明了 1860 年該館是設在上海虹口長老會上海布道站購買的緊鄰克陞存住宅旁的一處房地上，1862 年遷至小東門外的新館舍，1875 年 10 月遷往北京路。<sup>7</sup> 1867 年該館出版的《美華書館中文、滿文與日文活字字樣》一書中出

<sup>5</sup> 蘇精，《鑄以代刻》，（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頁 175、188。

<sup>6</sup> 同前引，頁 225-227。

<sup>7</sup> 同前引，頁 473-478。

現戴爾 (Samuel Dyer, 1804-1843, 又譯台約爾) 活字, 這一點很讓專家感到困惑, 作者通過長老會和倫敦會兩個教會檔案的比對, 揭示了這個問題的來龍去脈。<sup>8</sup>

最有意思的是, 我們都知道晚清天主教與新教曾經就基督宗教的術語和聖號等的翻譯, 以及如何盡可能地關照輸入地的文化語境和中國人的接受能力, 而又能儘量保持基督宗教的本真性等問題, 展開過激烈的論辯。《鑄以代刻》通過檔案告訴我們, 作為新教傳教機構附設的印刷所, 墨海書館初期的產品中, 有以天主教書籍內容為本的《聖教要理》和《聖經史記》, 而且一向對中文造詣自視甚高的麥都思還再三對《聖經史記》的「最純粹的中國經典筆調」表示崇高敬意, 為此還引發了天主教江南教區主教羅類思的強烈抗議。<sup>9</sup> 以往研究墨海書館的學者, 都很喜歡引用該館用牛作為滾筒印刷機動力的事實, 作者通過檔案給出了美華書館用牛拉動滾筒印刷機的形象畫面: 「兩頭牛輪班拉動轉輪, 轉輪的皮帶再發動印刷機, 因此得雇用一名工匠照料牛隻、一名工匠在機器印刷時上紙, 再一名領班照料整件事。」<sup>10</sup> 檔案中還保留了很多足以反映傳教士品格的一些有趣的細節, 如以往研究者很難找到這些來華傳教士收入的材料, 作者在該書第六章中以大量的檔案說明偉烈亞力 (Alexander Wylie, 1815-1887) 就婚後的年薪增加問題, 以及如何與麥都思發生爭執, 甚至為了自己所遭到的不公平待遇使用了粗暴的語言並拒絕道歉, 但最終傳教士們還是寬容大量, 彼此冰釋前嫌。還有是發生在 1862 至 1863 年間因范約翰從事土地房屋投資被華人告進官府, 輪值擔任上海布道站主席的姜別利 (William Gamble, 1830-1886), 因為抨擊范約翰的行為而遭到後者的反擊, 為此兩人甚至「舉拳相向」, 爭得不可開交, 這些都為中國近代外人在華傳教史提供了很多生動而又鮮為人知的歷史事實。<sup>11</sup> 《鑄以代刻》中還有一些從檔案中提取出來的寶貴材料。如記述 1865 年姜別利在美華書館曾親自教導沒有西式兩面印刷裝訂經驗的女工學會折紙和縫線,<sup>12</sup> 表明十九世紀六〇年代該館已有從事印刷裝訂的女工。目前仍作為中國近代工業史權威資料引用的孫毓棠 (1911-1985) 所編的《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中有關印刷業的資料, 主要來自《上海研究資料》及其續編、賀聖鼐《三十五年來之印刷術》等二手的資料,<sup>13</sup> 或以為中國最早的女工是出現在紡織

<sup>8</sup> 同前引, 頁 510-511。

<sup>9</sup> 同前引, 頁 189-190。

<sup>10</sup> 同前引, 頁 502。

<sup>11</sup> 同前引, 頁 211-217、482-483。

<sup>12</sup> 同前引, 頁 520。

<sup>13</sup> 孫毓棠編, 《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 第一輯 1840-1895》上冊 (北京: 科學出版社, 1957), 頁 113-120。

業，1872年陳啟沅創辦繼昌隆機器繅絲廠，是近代中國第一個民族資本經營的機器繅絲廠，曾「容女工六七百人」。<sup>14</sup> 1865年較之1873年要早八年，中國最早的女工是否可能首先出現在印刷出版業中呢？我以為很值得研究中國近代工業發展史的學者進一步研究。

寧波華花聖經書房是晚清出版史學者頗為注重的一個出版機構，該機構究竟出版了多少書，至今爭論不休。熊月之的《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一書指出1844至1860年間該機構共出書刊106種，其中屬於基督教義、教禮、教史、教詩的86種，占總數81%，屬於天文、地理、經濟、風俗、道德、語言等方面的有20種，占總數的19%。<sup>15</sup> 而黃時鑒在熊月之統計的基礎上有所增補，稱從1845至1859年的十四年四個月中，華花聖經書房出版的書籍確切可查的有132種，涉及了基督教教義、教禮、教史等，以及天文、地理、物理、歷史、經濟、風俗、道德、語言等，其中80%屬於基督教內容。<sup>16</sup> 龔纓晏則進一步修正了上述的資料，將種數增補為135種。<sup>17</sup> 《鑄以代刻》根據《長老會印刷所歷年書目》等資料，統計出從1845至1860年的十五年半期間，該書房的出版物不下於210種，並認為如果將再版或多版都一併統計的話，出版物總數甚至高達326種以上。<sup>18</sup> 這個數字遠遠超過廣州、福州、廈門，幾乎可以和同一時期上海的墨海書館相媲美，堪稱是當時全國外國教會印刷出版中文書刊的重要中心，實在是寧波華花聖經書房研究上的一個重大突破。如果作者能夠整理出一份關於寧波華花聖經書房出版物的簡明書目和分類統計表的話，那麼，對於讀者進一步瞭解檔案中所記錄的那些出版物的具體名稱和內容，我以為一定會大有裨益的。

充實的檔案史料，是《鑄以代刻》一書研究的前提，通過對大量英文傳教檔案艱苦和細緻的爬梳剔理，整理資料，闡幽發微，來重構晚清印刷出版的史事，堪稱該書的第一特色。不過由於作者所利用的主要是英文教會檔案，據作者自述，教會檔案中幾乎很少涉及非傳教作品，也很少涉及關於華人翻譯合作者的記載，即使有些關於華人的記述，如王韜等，也是因為他協助翻譯聖經並且受洗成為基督徒的緣故。所以，雖然作者已竭盡全力將檔案中有關非傳教性作品的材料予以析出，如關

<sup>14</sup> 同前引，下冊，頁957。

<sup>15</sup> 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頁170-171。

<sup>16</sup> 黃時鑒，〈寧波華花書房刊本知見略述〉，收入寧波「海上絲綢之路」申報世界文化遺產辦公室等編，《寧波與海上絲綢之路》（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353-362。

<sup>17</sup> 龔纓晏，《浙江早期基督教史》（杭州：杭州出版社，2010），頁188-189。

<sup>18</sup> 蘇精，《鑄以代刻》，頁408、411、426。

於 1861 至 1864 年美華書館非傳教性書籍的分析，<sup>19</sup> 但書中在討論墨海書館和華花聖經書房的過程中，涉及世俗的科學和人文書籍翻譯出版的史實尚欠充分，而在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過程中，這些非宗教讀物的影響力往往要遠遠大於宗教讀物，且中國學界，對於這些科技和歷史譯本的研究興趣，也要大大超過基督教宗教讀物。這可能是主要利用英文教會檔案的《鑄以代刻》一書，留給我們的一點小小的遺憾。另外，該書在西人譯名漢譯時所採用的方式亦有可議之處，如美國傳教士勃朗 (Rev. Samuel Robbins Brown, 1810-1880)，中文文獻中又譯布朗、蒲倫等，但道光二十七年 (1847) 在其自著《致富新書》已採用「鮑留雲」的漢名，一般似宜採用該人自訂的漢名為妥，類似例子還有 S. Dyer 的漢名，該書沿用舊譯名「戴爾」，據韓琦考證，其漢名實為「台約爾」。<sup>20</sup>

### 三、不疑處有疑

《鑄以代刻》主要是據第一手英文傳教士的檔案史料展開的，作者有其自身討論問題的線索，論著的特點是詳人所略和略人所詳。對於該書有關西方傳教士與中文印刷「變局」之主題，學界並無直接的研究，而相關的論著，該書則以「參考書目」的形式予以著錄，以示對前人研究成果的尊重，少許有關晚清印刷出版史和書籍史的研究，則以註腳的形式予以回應。

在晚清印刷出版史和書籍史的研究中，有若干公認的無可懷疑的權威論著，如 1867 年出版的偉烈亞力《基督教在華傳教士回憶錄》(*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該書是偉烈亞力親歷、親睹和親聞的「三親」著作，一向被人視為第一手的最可信資料。該書曾經記述《遐邇貫珍》的創刊時的主編是麥都思，第二年由奚禮爾繼任，1855 年再由理雅各接收編到停刊。由於偉烈亞力是與麥都思一起共事者，兩人關係密切，儘管曾有王韜稱「麥領事華陀主其事」，但不被學者重視，後人無從懷疑偉烈亞力這一說法的可靠性。但《鑄以代刻》的第七章通過《北

<sup>19</sup> 同前引，頁 526-538。

<sup>20</sup> 韓琦，〈從澳門、香港到上海——19 世紀中葉西方活字印刷技術在中國的傳播〉，收入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出版文化的新世界：香港與上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 141-151。

華捷報》等資料的考訂，確認麥華陀才是《遐邇貫珍》的真正主編。<sup>21</sup>

晚清來華後轉而替美國長老會服務的英國傳教士麥根陶（Gilbert McIntosh，或譯金多士、麥金托什）所著的《在華傳教會印書館》（*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一書（美華書館 1895 年版），也是流傳甚廣的有關寧波和上海長老會在華所辦印書機構的權威論著。麥氏長期專注於美華書館的研究，還撰寫過美華書館五十年、六十年和七十周年三本紀念性的文獻，因此該書在學界也屬無可置疑之作。麥根陶認為當時擔任華花聖經書房主任的姜別利，鑒於上海已是中國商業與傳教的中心，認為將書房遷至上海更適合長老會出版事業的發展，他的提議獲得了寧波美國長老會傳教士的支持，因而在 1860 年將書房遷至上海。<sup>22</sup> 這一觀點影響很大，為一些重要的印刷史著作，如張樹棟等《中華印刷通史》等沿用。《鑄以代刻》的作者利用美國長老會外國傳教部的檔案，包括姜別利在內的上海與寧波兩地傳教士與外國傳教部通訊秘書婁睿之間的來往信函，指出遷往上海的建議首先並非出自姜別利，而是寧波長老會不少傳教士的一種共識。早在 1852 年底，禔理哲就指出華花聖經書房所在位置的盧家祠堂附近是稻田和大片死水的大池塘，環境非常潮濕，有害健康，實在不適宜傳教士長期居留。在上海布道站的傳教士克陞存也有類似的看法，即認為遷滬的好處一是上海比寧波或其他通商口岸更易於接近內地；二是遷到上海後易於接受更多其他傳教會的訂單而降低印刷所的成本；三是較之寧波更易於收受從美國運來的油墨、鑄字金屬等材料。當然他也承認遷址面臨的問題，即書房在寧波的專用房舍將被廢棄、在滬需重建新址而增加開支；另外是遷滬後會面對來自墨海書館的競爭等。<sup>23</sup> 可見，當時在寧波和在上海的長老會傳教士，似乎都認識到同時存在的對書房遷滬所存在的推力和拉力。華花聖經書房遷址上海之舉，前後歷經七年多，在寧波、上海和紐約三地之間進行討論，這項遷移的原因和經過，絕非一般所謂姜別利鑒於上海的發展性而搬遷如此簡單的過程，這項遷移關係著長老教會在中國傳教事業的布局，也牽涉到基督教各宗派擴充在華勢力的合作與競爭。<sup>24</sup> 作者力圖通過繁複的檔案資料來證明，歷史所呈現出的面向，遠比我們想像得更複雜，從寧波到上海的空間轉移，是一種歷史的合力。

1921 年問世的蘭寧 (G. Lanning, 1852-1920) 和庫壽齡 (S. Couling, 1859-1922) 所著的《上海史》（*The History of Shanghai*），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上海史研究中權

<sup>21</sup> 蘇精，《鑄以代刻》，頁 276-284。

<sup>22</sup> 同前引，頁 441。

<sup>23</sup> 同前引，頁 442-444。

<sup>24</sup> 同前引，頁 454-469。

威的漢學名著。該書認為麥都思僅僅只是草創了墨海書館，而「真正的專業性工作」是偉烈亞力才開始的，特別強調了偉烈亞力在墨海書館發展中的作用。<sup>25</sup>且以往學者多認為偉烈亞力來華前是學了六個月的印刷技術，其實即使六個月也實在太短，因為傳統的手工印刷學徒需要經過三、四年才能學成出師，《鑄以代刻》根據檔案，證明偉烈亞力在倫敦僅僅學習了三個月，而工業革命期間的十九世紀中葉及其印刷工匠，絕非三個月所能養成，於是作者就偉烈亞力印刷技術不內行的問題，再引出對蘭寧和庫壽齡《上海史》中錯誤結論的批評，就很令人可信。<sup>26</sup>

《鑄以代刻》一書不僅為傳教士的舊著糾錯，對近人的研究，也多所採納更正。如美國歷史學家芮哲非 (Christopher A. Reed) 的《古騰堡在上海：中國印刷資本業的發展，1876-1937》(*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一書，自 2004 年由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出版以來，頗受學界好評，被譽為「研究中國近代出版史的力作」，2005 年獲得了第四屆國際亞洲學者大會「最佳亞洲人文科學研究獎」。該書的第一章講述了一位寧波官員和當地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 1846 年發生的事，那位官員非常欣賞長老會寧波布道站的華花聖經書房西式中文印刷的品質，因此攜來一部節錄自中國史書的抄本，請求傳教士以活字為他排印，不料最後傳教士卻予以謝絕了，理由是這將會有礙於華花聖經書房的非商業形象。《古騰堡在上海》認為這件事代表著西式印刷技術傳入中國的初期，不僅以大量生產為能事，讓中國人驚歎不已，其良好的生產品質同樣讓中國人心嚮往之。書中曾四次提到此事，可見芮哲非相當重視這件事的象徵意義。<sup>27</sup>《鑄以代刻》一書通過長老會檔案中兩件關於此事的函件，證明芮哲非對於這個故事的說法卻和史實恰恰相反，傳教士是同意為寧波官員印書的，反而是官員知道西式活字印刷的價格後打消了原意。<sup>28</sup>

《鑄以代刻》一書的作者不為印刷出版史上的今昔中外權威之所惑，在他人不疑處尋找疑點，用多種材料互相印證比對，在常人的不疑處存疑，與之進行批評和對話，亦是該書的一大特色。

<sup>25</sup> G. Lanning and S. Couling, *The History of Shanghai* (Shanghai: Kelly & Walsh, 1921), p. 444.

<sup>26</sup> 蘇精，《鑄以代刻》，頁 202-210。

<sup>27</sup> Christopher A.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pp. 43-44, 73, 83, 84.

<sup>28</sup> 蘇精，《鑄以代刻》，頁 437-439。

#### 四、「典範轉移」的歷史合力

印刷術在西方被譽為「文明之母」和「自由火炬」，社會文化轉變的「推手」。金屬活字印刷的發明者古騰堡被譽為第一位在歐洲傳播「啟蒙之光」的匠人，金屬活字印刷被稱為「神術」。<sup>29</sup> 中國圖書出版發展史上有幾次重大的「典範轉移」，<sup>30</sup> 都與文獻複製手段的變化有密切的關係。一是唐宋時期從之前印章、拓印基礎上發展而來的雕版印刷技術、活字印刷技術的發明和運用，使知識傳播的媒介從寫本轉變為印本，而這一「典範轉移」很可能與佛教的經文和道教符咒的刻印有關。圖書複製流通數量增多，知識資訊的傳播交流加快，從而導致了無論閱讀、研究、攜帶和流傳等傳播形式的根本性的變化；印本圖書的發行數量龐大，使圖書版本多元化，圖書成本較之寫本抄本低廉易得，使真正的圖書市場得以形成。印本圖書的流通和典藏，對於知識的傳播和接受，意義重大。中國圖書出版史上的第二次「典範轉移」是在晚清。中國印刷出版，直至十九世紀為止主要還是以雕版印刷為主。<sup>31</sup> 第二次「典範轉移」是以近代的石印術、西式活字取代木刻，機械印刷代替手工印製。這一巨大的轉移還伴隨著從「傳統書業」至「現代出版」的轉變，進一步引發圖書文化一連串的變動，導致了印刷、裝訂等方面區別於古代出版的一系列的技術變革，首先是圖書複製的速度大大加快，產量也明顯增多，成

<sup>29</sup> 梅洛，〈何為書籍？何為書籍史？——出發點與展望〉，收入韓琦、米蓋拉 (Michela Bussotti) 編，《中國和歐洲：印刷術與書籍史》（北京：商務印書館，2008），頁 239-254。

<sup>30</sup> 所謂「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又稱「範式轉移」，該詞最早出現於美國科學史及科學哲學家湯瑪斯·庫恩 (Thomas Samuel Kuhn) 的代表作《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1962) 一書中。這一術語原是用來描述在科學範疇裡，一種在基本理論上從根本假設的改變，後來亦指凡是一個學科發展史上具有根本性意義的巨大轉變，不同的領域有不同的「典範」，如建築領域有「建築典範」，圖書印刷出版領域也有自己的「典範」，當一個穩定的「典範」如果不能提供解決問題的適當方式，它就會變弱，從而出現「典範轉移」，在這種轉移的過程中，會出現大大小小的許多「變局」。

<sup>31</sup> 肇始於北宋年間的布衣畢昇泥活字的發明和之後的運用，元朝王禎曾經製作過木活字及轉輪排字架，南宋和元代也陸續出版過一些木活字印書，之後也出現的錫活字、鉛活字、銅活字等金屬活字。但這項技術沒有得到普及，清末《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中著錄的歷代書籍 7,748 種，20,000 部，其中活字印本僅 220 部。理論上講，中文活字印刷較之雕版印刷效率要高，但漢字是表意文字，存在由大量同音的異義字，活字印書至少需要幾萬個字的字範，從技術經濟學角度來看，成本過高，對於印刷量不大的書籍，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這也是活字印刷從宋代印本文化形成以來，一直沒有從根本上取代雕版印刷的原因。

本下降帶來了書價的低廉而使知識普及範圍空前拓展。其次，由於鉛印本體積開本縮小，頁數取代葉數，板框欄線消失，版面趨於簡化、之後又採用洋紙兩面印刷，不僅有助於節約圖書的用紙量，也使圖書的典藏空間大大縮小。再者，圖書的面貌從此改觀，線裝都改為平裝或精裝，直立插架代替了平直存放，書脊朝外並印上書名作者。<sup>32</sup>

值得特別提出的是，如同中國圖書出版的第一次「典範轉移」與佛教傳教相關一般，<sup>33</sup> 第二次「典範轉移」也是與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活動聯繫在一起。西方傳教士引介西方印刷術原是為了便於傳教，結果卻遠超出預定目的之外，不但改變了中國已有千年傳統的圖書形制，而且促成近代中文報刊的出現。傳教士們把自己日常生活環境中理所當然的一種新的傳媒形式——報刊，帶到了中國。<sup>34</sup> 晚清報刊雖也有採用木刻，但鉛印和石印方式還是占了幾乎一半以上。<sup>35</sup> 產生了真正意義的近代化的圖書出版業。這種轉變還反映在圖書出版管理體制的變化上，傳教士出版機構一改傳統中國書坊內部管理單一的形式，採取了較為現代的管理體系。<sup>36</sup> 印刷

<sup>32</sup> 關於西方印刷術傳入及其對中國影響的討論，詳見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頁 286-291。

<sup>33</sup> 錢存訓曾指出：「中國和世界其他地方相同，宗教最初也是鼓進印刷的推動力。但一俟印刷技術發展成熟，世俗印物遂逐漸取代以宗教為主的印書。宗教書籍產量日趨低落，亦如日後在歐洲的情況相似。早在十世紀後唐時，馮道借用刻佛經之術，又有鑿先此刻石經之舉，校刻成儒家五代監本九經。自此刊印儒經、史書、雜著之風盛行。」雕版印刷發明於隋唐，就目前所見的印刷品實物均為佛教經文與咒語，如 1966 年在韓國境內新羅王國的首都舊址的慶州佛國寺石塔中發現的大約刊刻於 704 至 751 年間的雕版《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日本稱德朝間 (764-770) 納置在百萬小木塔中的四種不同的《陀羅尼經》咒本，唐懿宗咸通九年 (868) 王玠印製的《金剛經》。參見錢存訓著，劉拓等譯，《造紙及印刷》（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95），頁 193、195、399、416、459。中國現存最早的十二世紀初的木活字印刷品《吉祥遍至口和本續》也是西夏文佛經。參見潘吉星，〈韓國新發現的印本陀羅尼經與中國武周時的雕版印刷〉、牛達生，〈我國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收入第二屆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籌備委員會編，《中國印刷史學術研討會文集》（北京：印刷工業出版社，1996），頁 188-204、64-77。

<sup>34</sup> 近代第一種中文雜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雖以木刻印刷，但有時卻隨刊發行以鉛字排印的「新聞篇」一頁，內容包括時事消息、社會新聞，這是中文報刊與西方印刷術的第一項關係。參見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 288。

<sup>35</sup> 湯志鈞曾分析過戊戌時期的 36 種報刊，指出其中鉛印 12 種、石印 9 種、木活字 5 種、木刻 3 種、不詳 7 種，鉛印和石印合計，至少占全部的 59.3%，參見湯志鈞，《戊戌時期的學會和報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頁 105。

<sup>36</sup> 從東印度公司的澳門印刷所開始，就採取三級制的管理體系，由印工管理工匠和印刷所的技術、排印與日常事務；上面是由二至三名商館職員組成的印刷所委員會負責印工的工作，制定印刷所管理規則，審核印工的經費申請與結報等，最高一層是包括商館大班在內的決策委員會來決定印刷內容與全盤業務，並將印刷所的重大人事的去留上報董事會。而從澳門遷至寧波的老會館印刷機構更是如此，華花聖經書房的出版業務有一個出版委員會 (Publishing Committee) 負責管理，主

技術的變化，也促發了中國出版業銷售方式的變化。<sup>37</sup> 這些都為中國圖書的出版和傳播帶來了新的氣象。在十九世紀以來中國社會近代化的過程中，西方印刷術扮演了重要的傳播工具角色。如果說歷經千年的手工製作的雕版印刷是中國圖書文化的重要特徵與技術基礎的話，那麼這一技術基礎卻在十九世紀內遭遇了西方傳教士引進石印術和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戰，印刷生產方法的改變是近代中國圖書文化發生變化的第一個環節。

《鑄以代刻》所研究的是十九世紀第二次「典範轉移」過程中，雕版印刷被傳教士西式活字印刷普遍地取而代之以形成的「變局」。西方的鑄字印刷術東傳，不僅全面取代中國木刻印書傳統，更深刻地影響百餘年來的圖書出版。西式活字印刷術自古騰堡發明以來，在十九世紀傳入中國之前，在西方已通行了四百年，但要將之應用於中文印刷卻不是件容易的事。因為中西活字印刷術的不同，中國的活字是逐一以手工刻製而成，同一頁文字內容出現幾個同一字，就要刻幾個同一字，因此每個字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同，每個活字都是獨一無二的存在。而西式活字與之不同，拼音文字只需打造一百多個字母、數位與符號的鋼質字範 (punch)，再以字範在銅版上敲出字模 (matrix)，接著以字模鑄出鉛活字 (type) 即可。但拼音文字與方塊字的不同，要在每個只有零點幾公分的見方的堅硬鋼材上雕刻幾萬個象形漢字的字範，是幾近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此必須有所變通。一個方式是只打造常用字，倫敦會的傳教士就耗費了三十年功夫鑄造了大小兩副活字，每副各有 6,000 個漢字，二是以部首偏旁拼合成字，如美國長老會美華書館陸續擁有的巴黎、柏林、上海等三副活字，每副各有 4,000 至 7,000 多個活字，分別可拼成二萬多個漢字。兩種方式各有無法避免的缺點，前者在遇到非常用字時則以木刻活字替代，有損版面的美觀；而後者以機械生硬的部首活字拼合，也會犧牲漢字字形筆劃的勻稱。<sup>38</sup> 這是活字印刷傳入中國初期所遭遇的難題之一，也是為何初期在沿海口岸城市主要

---

要職責是對印刷所的發展提供建議，遴選擬出版的書籍，決定印量、版式和發行，書籍的編輯和排印中校對，決定機構運營的費用等其他相關事項，委員會還有監督書房主任的職責。蘇精，《鑄以代刻》，頁 41、357-358。

<sup>37</sup> 中國傳統的木刻印本原則是「一版多刷，每刷少量」，因為雕版可以儲存，便於重複印刷，出版者可以根據市場情況決定印刷的數量，以免積壓資金；而鉛印和石印圖書的出版形態不同，通常不留版再印，因此印量一版較大，為了避免積壓資金和騰出倉儲空間，印書機構就需要講究行銷宣傳，創造市場和讀者，出版者之間的競爭使傳統的被動保守轉變為主動出擊，積極預先籌畫，出版者與作者和讀者之間也產生了新的互動關係。參見蘇精，《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頁 289。

<sup>38</sup> 蘇精，《鑄以代刻》，頁 2。

流行的是西方石印術的原因。

另一個難題是如何在中國推廣使用西式活字印刷。《鑄以代刻》討論的就是基督教傳教士自 1807 年來華至十九世紀七〇年代為止，六十餘年間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全過程，以及他們創立與經營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動。作者將這個過程大致分成討論與嘗試 (1807-1839)、準備與奠基 (1840-1870)、發展和本土化 (1871-1898) 三個時期。作者主要討論前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從馬禮遜來華到鴉片戰爭前，主要處理傳教士在廣州、澳門及東南亞各地嘗試各種印刷中文的方式，這一段與作者之前的《馬禮遜與中文印刷出版》一書主題相同，但範圍內容有別，有相當的篇幅是研究麥都思及其巴達維亞印刷所，該所先後採用了中文雕版印刷、石印和西式活字印刷，具有豐富中文印刷經驗的麥都思在 1834 年《中國叢報》上發表了比較三者的成本與優劣的長文，得出了西式活字印法最為合適的結論。<sup>39</sup> 自鴉片戰爭到同治朝的約三十年間，西式中文活字進入了實用階段，並因而奠定在華傳播的基礎，《鑄以代刻》有將近一半以上的篇幅是討論這一階段的變化。從技術上看，傳教士不僅繼續以西方傳統工序鑄造中文活字，特別是姜別利從 1863 年起，在五年內陸續完成了香港活字、上海活字、柏林活字、台約爾活字、巴黎活字等大小六副活字的新創、改善和增補，也以價廉工省的先進電鍍技術大量複製。<sup>40</sup> 這一時期西式活字已充分具備和木刻競爭的技術與生產條件，更重要的是西式活字印刷中文的方法，終於引起了迫切需要學習西方長技的中國人的注意，有些官員和士紳階層，如郭嵩燾、王韜和一位住在廣州的翰林等，也對此感到興趣，太平天國的領袖人物之一洪仁玕也來商洽購買印刷機和活字，上海道台丁日昌甚至計畫購買英華書院的字模，儘管傳教士理雅各意識到這種出售可能給自己帶來商業風險，但他還是願意賣給丁日昌，因為他認為這是中國官員真心重視西方知識和使用的一個指標。<sup>41</sup>

近代的機械印刷代替手工印製，西式活字取代木刻、逐漸達到與石印術旗鼓相當，並最終取代石印術成為傳播新知識的主要載體，這一過程構成了近代的第二次中國圖書出版的「典範轉移」。這一堪稱「出版革命」和「知識革命」的「典範轉移」，同時伴隨著這些基督教出版機構在空間上由南而北的轉移。《鑄以代刻》的十二章描述，正巧呈現出從巴達維亞、澳門、香港、寧波到上海的空間移動。以西

<sup>39</sup> 同前引，頁 102-103。

<sup>40</sup> 同前引，頁 507-514。

<sup>41</sup> 同前引，頁 294-296。

方傳教士為主導帶動的這一巨大的從「傳統書業」至「現代出版」的轉變，還有一個複雜的本土因素在起著重要的作用，即這一從麥都思巴達維亞印刷所到墨海書館，從澳門校書房、寧波華花聖經書房到上海美華書館的書局搬遷過程，同時伴隨著這些書局如何從中國文化比較疏離的地區，向中國文化的核心地——江南的北上轉移，而此一時期的上海，也正面臨著江南腹地的書業的區域移動，大批江南書業的商人遷來滬上，這種區域移動與外國傳教士西式印刷技術的由北而南而的空間轉移之間，究竟存在著怎樣一種互動關係，有哪些複雜的歷史合力，還有許多值得進一步展開的面向。

（責任校對：王淳容）

（收稿日期：2014. 9. 5；修正稿日期：2014. 11. 18；通過刊登日期：2014. 11. 25）

